

石仲泉 著

我观

周恩来

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观周恩来

石仲泉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观周恩来/石仲泉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199-928-3

I. 我… II. 石… III. 周恩来(1898—1976)—人物评论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614 号

书 名: 我 观 周 恩 来

作 者: 石仲泉

责任编辑: 陈海平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2mm×230mm 1/16

字 数: 468 千字

印 张: 28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99-928-3

定 价: 49.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作者简介

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1938年5月出生，湖北人。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64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8年底调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调入中央党史研究室。学术职称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首席专家。其他社会兼职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组副组长；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党校、军校兼职教授。

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研究，曾参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组等工作；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卷》稿。个人主要专著有：《我观毛泽东》、《周恩来的卓越奉献》、《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我观党史二集》、《长征行》和《三个代表思想：领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论》等。合著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等。主编的著作有：《毛泽东思想方法导论》、《毛泽东研究述评》、《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共八大史》、《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中国共产党新世纪宣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思想》等。有多本著作和多篇论文荣获国家级图书奖和优秀论文奖。

新版的话

眼看纪念周恩来诞辰 110 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出版社催促将 1993 年出版后又重印过两次的《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增订再版。本来，个人也早有此意。因为 2001 年 7 月《我观党史》出版后，就萌生了将已出版的部分拙著整合为“我观”系列的想法。在 2003 年 11 月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之际，将《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改版为《我观毛泽东》了；在 2004 年 7 月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之际，将《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增订改版为《我观邓小平》了。剩下的关于周恩来这本书，准备在今年增订改版时，扩充些内容，增补 10 多篇，字数与我观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两本不相上下。但很遗憾，近两年来忙于其他写作已无暇顾及该书，这次改版只有少量的增补。这是既对不住我崇敬的周恩来，也对不住与我同样对周恩来怀有深厚感情的读者的。

这次增补，主要有三篇长文。一是 10 年前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时写的《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以“三不朽”标准立论，从“立功”看周恩来的伟业巨绩，从“立言”看周恩来的思想理论，从“立德”看周恩来的精神风范，对“又一历史伟人”这个命题作了比较展开的论述。二是 5 年前纪念周恩来诞辰 105 周年时写的《周恩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楷模》，提出研究周恩来 26 年的执政生涯，是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绝不可少的“百科全书”。该文从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一是励精图治，执政兴国；二是呕心沥血，执政为民；三是殚精竭虑，执政安邦；四是倡俭戒奢，执政清廉。最后的结论，“如果我们的普通党员都是雷锋式，党的干部都是焦裕禄式，党的领导人都是周恩来式，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将一定万岁，万万岁！”还有一篇，就是最近为纪念周恩来诞辰 110 周年匆忙草就的《为周恩来辩护》。鉴于有的境外著述以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为名，讲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对贬损周恩来产生了不小影响，感到需要对一些说法进行辨析。其主要内容为“愚忠说”辨，“帮凶说”辨，“伪君子说”辨，“自保说”辨，最后提出希望建立“周恩来学”。写这几篇拙

文,都是旨在对长期以来的“周恩来情结”作一个阶段性的了结,以还过去说过的对他欠的“情债”和“文债”。

新版《我观周恩来》对原版《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在编排体例上作了些技术性调整和个别文字的校订。为同“我观”系列的其他几本拙著大体协调,新版书将原版书的“上编”、“下编”,改为第一编和第二编,新增补的几篇,除一篇收在第二编外,都为第三编。此外,改变了原来的“分章”体,去掉了章序。

还要说明的是,原版《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在1993年面世以来,关于周恩来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和发表,以及对他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跟15年前相比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这些年来,尽管仍然关注周恩来研究,但我个人却没能作系统研究,只是在几个周年临近时作点纪念性研究。这次新版增补对原书内容没作修改。一是没时间从容进行;二是也有保持研究的原真性想法。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即15年以及更早些时写的第一、二编的文章与近几年写的第三编的文章,可能在个别问题的认识或表述用语上前后不那么衔接,有的观点也不一定是个人现在的看法。还有就是过去的那些文章,因是在不同情况下写的,其体例不完全一样,这次也来不及一体化了。这反映了历史行进的烙印和思维运动的轨迹。新版保持“原汁原味”,让读者去评析吧。它既说明了个人认识和写作的局限性,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历史发展的变迁性。

记得在原书出版时说过“写作匆匆”之类的话,这次仍没能改掉这个缺点,乃有愧读者。原版匆匆,改版匆匆,何时不再匆匆?我真难以给予一个明确说法。这些年也算在“老骥伏枥”,没有停蹄,写作任务未断,很少有歇歇脚的时候。我很想像时下提倡的“快乐足球”那样,也快乐写作,但没那个能耐。“写作的进行式”很难说有快乐之感,只有到了“写作的完成式”才能享受快乐。当然,“写作的完成式”还有另一种解读,即不再写作。但这里不作那种解读,我希望再过5年左右,下次再版这本拙著时不再讲“匆匆”二字了,算是给愿意读我的书的读者一个交代。诚恳欢迎广大读者对拙著《我观周恩来》进行批评指正。

石仲泉

2008年2月29日

前言

对于周恩来，我总感到既欠了情债，也欠了文债。长时间以来，一直惴惴不安。直到赶写出《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这一章，才如释重负，对冥冥之中的“敬爱的周总理”似有了一个交代，即使是很不像样子的交代，权且算暂表心意。

就我们这一代人言，主要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才逐渐对周恩来有所了解，并加深敬仰的。在“文化大革命”前，通过党史学习，知道周恩来的一些革命业绩；从老干部那里也听说他犯过一些错误，但都是些半鳞片爪，无论在总体或细节方面都不甚了了。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造孽，当“十恶不赦”。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老青年”来说，它也有一条“好处”，就是经风雨，见世面，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知道了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了解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东西。一个时期不是讲“透明度”吗？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透明度”是比较高的。大字报和“小报”材料满街都是，“中央首长”讲话几乎天天能见到。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哪个“首长”讲了什么话，不用24小时就能辗转听到一二，不少信息既快且“准”。正是这些“野史”和“马路新闻”，当然更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亲见、亲闻、亲历，渐渐增加了对“周总理”的了解和敬爱之情。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谁都看得出他的讲话与林彪、江青们的讲话的“调”和“味”不一样。在那几乎一天揪出一个“大头头”的邪恶日子里，不少人为他的讲话捏一把汗，为他的命运担忧。到了“九一三”事件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是与非为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看清，因而对“周总理”更加敬重。在党的十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反小子”居然一步登天，似乎坐上了“接班人”的交椅；“刁德一”式的人物当上了政治局常委；以“吕后”自诩者继续盘踞政治局，不少人心里感到堵得慌，怎么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堂堂大党，就没有人才了？1974年1月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们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将矛头直指“周总理”，使更多的人愤愤然。这年夏天，从报载知道“周总理”住进了医院，就使人们为他的健康不仅担

心,后来简直是揪心,他的健康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1976年1月8日晚上,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噩耗后,不知有多少男女老少成了“泪人”,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哭作了一团。我们这个普通家庭也是如此。奇怪的是,“当局”竟下达一道又一道禁令,不准悼念自己的“总理”。但是,日渐觉悟的人们没理那个碴儿。到1月15日那天,不顾凛冽的大自然寒风和肃杀的大政治寒流,百万群众涌上十里长街为敬爱的“总理”送灵。当时,我跑到西郊木樨地也目睹了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情景。政治异常现象还在继续,“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将“反击右倾翻案风”喊得震天价响,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文章接二连三见诸报端。民心、党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清明时节,以一些大城市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终于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始料未及的。参加的主体成分还是当年的那些“红卫兵”们。**“十年没有树木反树了人”啊!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在嘲弄运作它的人们。我当时所在的工作机关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几乎每天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去看花圈,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和诗词,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收缴“反革命诗词”,追查“政治谣言”,我也被涉嫌。因为我在1月份曾填了“哭总理”的三首词,办公室的同事的朋友将一首传到天津,不知怎么几经辗转,竟被谁传为毛主席写的,在天津被作为“政治谣言”进行追查。多亏所在单位的领导与同事对我加以保护,才幸免一难。但是,也紧张了好几天。怕“抄家”,将1月填的三首词稿和在纪念碑前抄的诗词之类统统烧了。经过这点小小风波,我对周总理的感情又深了一层。

1976年金色的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从1977年1月初起,报刊上不断登载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不少文章非常感人。对他的传奇事迹,越介绍越多。经过十多年的感受和积淀,**“一代英豪,百世楷模”的形象渐渐地在脑海中形成,于是萌发了要积累资料,研究周恩来的念头。**周恩来的丰功伟业、文章道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太值得研究了。利用闲暇,不到一年,就攒了十几个文件袋子的剪报资料。以此为基础,试着编写“周总理”的传记文学,同时写一些研究周恩来的文章。传记文学,由于缺乏必要的档案文献,没能进行下去。作为研究周恩来思想的成果,就是本书开卷篇的《周恩来和五四运动》、《伟大的飞跃——周恩来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是1978年和1979年初的事了。写作《伟大的飞跃》一文,花了些功夫,自己也感到有理论力度。《北京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这也

增强了要继续研究周恩来的决心和信心。这以后,随着工作岗位的调动和工作任务的加重,周恩来的研究搁下了两年。这算我研究周恩来的第一阶段。

研究周恩来的第二阶段,是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后的1981年初《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之际。那时,借调在外参加一些写作任务。利用业余,写了《周恩来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的思想发展》等章的原型——目前的这些章节是以那时发表的文字为基础进行修改的。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配合《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的宣传,除了一二篇文章较为满意外,大部分文章的深度不够。

研究周恩来的第三阶段,是在周恩来生平与思想研究组工作的1983年和1984年。长期想以研究周恩来为本职的愿望才得以实现。这两年是研究周恩来收获较多的时期。一是任务单纯,就是研究周恩来,有时间去阅看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搞研究,这是基本功。不接触第一手原始材料,花时间去琢磨它,写文章就没有根底。这两年使我真正进入了“角色”。二是参加了金冲及教授主编的《周恩来传》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老金同志是近代史学家,治学严谨,思路开阔,文字讲究。我尽管跟着老金同志只参加了部分工作,但受益匪浅。我是学哲学的,比较适应理论研究,而人物研究却更需要熟悉历史和善于运用历史文献。这两年的“周传”工作,有助于开拓适合自己情况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的统一之路,即走出自己的研究路子来。本书的大部分章节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或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思路,准备了材料,写了初稿。《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周恩来与长江局》、《周恩来在社会主义时期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运用》等,从个人感觉言,尽管也在配合一个时期的宣传任务,但更具研究的特色。

研究周恩来的第四阶段,则是最近两年(90年代初——编者注)。党史界的师友和同行们一再敦促,希望我将以前发表的文章结集或改写成专著出版,作为《毛泽东的艰辛开拓》的姊妹篇。我非常感激这些同志的鼓励和关怀,不是他们的催促,这本书是难以问世的。压力变动力。尽管又是业余研究,但使我集中了精力,放下或推却其他稿约,比较专心地来撰写这本书。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已发表过的文章没作大的改动,以保持原来的思想风貌;但为了体例一致起见,按照专著形式作了些技术性处理。这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补写了几章:《周恩来与新四军》、《周恩来与重庆——南京谈判》、《周恩来在解放战争中》、《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和《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等。所以要补写,一是过去已积累了一些资料,有一定基础;二是使这本书的内容尽量完整一些,既然是讲周恩来的卓

越奉献,就应力所能及,尽量讲得丰满一些。有些问题没有研究,短时间难以弥补,就只好留下一些空缺。这也就形成了目前这本书在思路、风格、篇幅和文字都不尽统一的格局。这既是遗憾,也说明欠的“周总理”的情债和文债没有还清,还需要继续周恩来的研究。

在这四个阶段集中研究周恩来尽管只有二三年(因工作关系,其间不少年头转向毛泽东研究),但前后研究的时间跨度却长达十一二年。这么较长的研究积淀,特别是经过一段毛泽东研究之后,作为周恩来研究的“票友”(实在不敢妄称周恩来的专职研究者),我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在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各位老一辈革命家们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以各自的特色对后世发挥影响。其间就毛泽东与周恩来相比较而言,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这么讲,既丝毫不意味着要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们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思想”,毛泽东没“精神”。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只是就某个方面突出某个特点的比较。所以着意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因为他们俩在这一代老一辈革命家中,共事时间最长,对党的历史发生影响的时间也最长;毫无疑问,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姑且以“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

这里,“毛泽东的思想”即指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可以说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上来说的。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会在经过一定条件的转化之后对历史产生积极影响,但那是有条件限制的,是在实现“转化”之后才能这样,而在未完成这一转化之前的直接作用则是消极的负效应。至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界说,这里不再赘述。那么,什么是“周恩来的精神”呢?怎么样对它加以科学概括?见仁见智,会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法,不揣冒昧,在我看来,至少是否应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无我精神。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正如他自己在苦撑“文化大革命”的危局时所表示的,他这一生只有八个大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就是毛泽东倡导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他完全超越了自我,达到了“无我”的精神境界,“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党的领导层中,他是率先进入共产党人这一最高精神境界的领导人。

(二)求是精神。即实事求是,唯真务实的精神。他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理想必须同现实相结合,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多角度地、辩证地、全面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各种形式的极端化和片面性,提倡“戒慎恐惧”、“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特别是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更是强调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根据需求和可能,既积极又稳妥地来发展经济,既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又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因此,周恩来被国内外的评论家们一致赞誉为“实事求是的楷模”。

(三)创新精神。周恩来既讲究实事求是,又强调解放思想;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既主张“戒慎恐惧”,又要求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这就是说,既不能对周恩来的“求是”精神作消极的理解,也不能误认为周恩来是谨小慎微、顾虑重重的保守精神的代表。周恩来确曾一度被批评为“右倾保守”,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四人帮”污蔑为“保守势力的总代表”。这些不实之词已被历史所否定。事实上,周恩来是很注重发挥革命创造精神的,不墨守成规、不被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住。他领导的统战工作、文化艺术工作和外交工作,不断开拓出崭新局面,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繁荣,就是这种创新精神的最好说明。

(四)民主精神。在我党领导人中,富有民主精神者不少,但难得的是,周恩来能一以贯之。自从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以后,能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民主作风。毛泽东曾赞誉周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最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胸怀广阔,光明磊落,赤诚待人,通情达理,能够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能够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处境和困难,能够在分歧的意见中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就是对于持错误意见者,也能耐心说理,循循善诱,不强加于人。所以,他结识的人最多,各方面(包括海外和国际上)的朋友最多,被人们视为最富有民主精神的领导人。

(五)廉洁精神。周恩来身居高位,从不把自己看作是特殊人物,凡是要求党员和公民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而且要求做得更好。他把为革命出生入死,建立功业,看作是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从不把功劳、贡献作为向人民索取的“资本”。他带头严格遵守国家的各种法律、制度和规定,不搞任何特殊化,从没利用过手中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过半点私利。即使是被视为生活细节的区区小事,他也率先垂范。他廉洁奉公的事

迹数不完,传不尽,为世人赞不绝口,感动不已。他的这一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在现代的发扬光大。这也是他作为“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至今还深深地活在人民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严细精神。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连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在周恩来面前,“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深刻的印象。”^①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对周恩来的这一精神有一段广为传诵的名句:“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神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节奏。”周恩来确系如此。他的严细精神,不仅表现在考虑问题周密、细致,更在于他对于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无论建国前后,他都是日理万机,非常忙碌,但却始终保持了一丝不苟、严谨周密精细的工作作风。他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他对国防科技工作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是他的座右铭,也是对严细精神的具体要求。这是“周恩来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

(七)守纪精神。周恩来高度重视纪律修养,严格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在1943年的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曾把“遵守纪律”作为其“修养要则”之一。在50年代,他曾对外交工作制定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的十六字守则。他在各方面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并给大家做出了表率。他与邓颖超是夫妻,又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邓大姐对他评价说:在党内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他俩从来不讲党的纪律不许讲的话,不做党的纪律不许做的事。在60年代试验原子弹时,周恩来说过: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周恩来在病危时不无遗憾地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并互敬互爱的革命伴侣,彼此都知道最后诀别的时刻即将降临,但他们仍然终生遵守党的纪律,把没有向对方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各自的心底。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守纪精神是举世罕见的。

(八)牺牲精神。这是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献身精神,也是周恩来党性修养的重要准则。在周恩来一生传奇般的经历中,不知有过多少次荣与

^① 方钜成、姜桂依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272页。

辱、生与死的考验。周恩来都经受住了。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不去计较个人的权力地位、利益得失、荣辱升降,始终都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为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难中,他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几乎达到了极限。在战争年代,他不仅出入枪林弹雨,而且身居龙潭虎穴,从不考虑个人安危。他多次置于危险境遇之中,但都临危不惧,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地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他不怕艰险、不怕困难、不怕屈辱、不怕牺牲的精神,可以说是“无我”精神在特殊条件下的体现。

上述八种精神虽然不能说包括了“周恩来的精神”的全部丰富内容,但其主要方面和基本内容大体论列到了。当然,还可以不断修正,使其更臻准确和完善。这八种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是共产主义精神。这就是“周恩来精神”的真谛。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就要宣传“周恩来精神”。我赞成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的序言中说的:“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周恩来的精神”能够向青年们揭示人生真谛。在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形势下,在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过程中,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研究“周恩来的精神”、宣传“周恩来的精神”、学习“周恩来的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书的宗旨虽然是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不是专写“周恩来的精神”的,但也期望能在研究和宣传“周恩来的精神”方面发挥微薄之力,以表对周恩来的95周年诞辰的纪念之情。

本书在写作和编辑过程中,长期得到一些同事和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在此深致感谢。此书一些章节写作匆匆,有的又写作较早未来得及大改,缺点舛误可能不少,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石仲泉

1992年11月

目 录

第一编

周恩来和五四运动 / 1

- 一、领导天津学生运动,表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 1
- 二、倡导科学与民主,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 4
- 三、带头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 7

伟大的飞跃——周恩来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 11

- 一、在五四运动中,周恩来的思想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 11
- 二、旅欧勤工俭学,周恩来实现了伟大的思想飞跃 / 14
- 三、对周恩来实现思想飞跃的原因分析 / 16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的思想发展 / 19

- 一、坚持无产阶级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权 / 19
- 二、支持蓬勃兴起的工农革命运动 / 23

2 / 我观周恩来

三、重视武装斗争，首倡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 / 26

周恩来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 31

一、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 31

二、对瞿秋白、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 34

周恩来与党的白区工作 / 40

一、白区工作是党领导革命的一条重要战线 / 40

二、从客观实际出发，确定党在白区的工作方法、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 / 42

三、扎根群众，关心群众，引导群众进行经济、政治甚至武装斗争 / 43

四、正确处理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等关系，学会开展群众工作的艺术 / 45

周恩来对华北抗战的贡献 / 47

一、坚持抗战第一原则，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敌 / 47

二、坚持武装民众方针，发展华北游击战争 / 52

三、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努力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 / 56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 / 62

一、周恩来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 / 62

二、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军事和政治合作的主要代表 / 67

三、周恩来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 / 72

周恩来与长江局 / 78

- 一、应该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 / 78
- 二、周恩来是长江局的灵魂,在总体上代表的是正确路线 / 83
- 三、王明对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影响,以及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失误 / 90

周恩来与新四军 / 96

- 一、参与组建新四军 / 96
- 二、皖南行——确定新四军发展方针与调解叶(挺)与项(英)矛盾 / 101
- 三、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后参与决策维护与声援新四军的斗争 / 109
- 四、谋划新四军五师的中原突围 / 116

周恩来与重庆——南京谈判 / 122

- 一、谈判——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 / 122
- 二、不是战场,酷似战场,甚至胜似战场 / 128
- 三、谈判斗争的高超艺术 / 135
- 四、谈判的基本经验 / 145

周恩来在解放战争中 / 153

- 一、在转战陕北中的作用 / 153
- 二、参与大决战的战略决策 / 161
- 三、领导第二战场的斗争 / 166
- 四、筹建新中国 / 172

周恩来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186

- 一、对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 / 186
- 二、对武装斗争经验的总结 / 190